

道义、交换与移民跨国实践^{*}

——基于衰退型侨乡海南文昌的个案研究

黎相宜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侨乡研究; 跨国实践; 侨捐研究; 华侨投资; 道义关系; 交换关系; 全球化

[摘要] 论文以海南文昌侨乡为例, 探讨了基于传统道义与交换互惠两种跨国关系的移民跨国实践的变化及其给侨乡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 文昌的海外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经济与声誉地位同时上升的过程, 再加上受到多层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 纯粹社会声誉与身份归属方面的补偿不再对其构成吸引力, 使得文昌移民与家乡一直持续的传统道义关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毁, 基于传统道义关系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馈赠模式对于文昌移民的吸引力在下降。不少文昌移民试图与家乡重新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道义的、互惠互利的社会交换关系, 发展出一种既可赚钱又可普惠地方的跨国实践模式。而由于土地纠纷、行政干预等问题, 海外移民与当地政府并没有建立良好的交换与互惠关系, 使得盈利性跨国实践也没有在文昌移民群体中大规模兴起。这些都进一步导致文昌移民在祖籍地的跨国实践逐渐衰落, 也使得侨乡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效应逐渐式微。华人本着爱国和慈善精神汇款回中国的时代, 已经转变为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着重投资的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5)03-0055-09

Morality, Exchange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n Wenchang, Hainan, A Declined Qiaoxiang

LI Xiang-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Key words: Qiaoxiang; transnational practice; donations by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by Overseas Chinese; moral relations; exchange relations; globalization

Abstract: Taking Wenchang, Hain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wo types of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sed on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brought changes to Qiaoxiang.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hinese from Wenchang increased both their income and reputation through mig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decline of attraction from social reputation, morality structure of Wenchang immigrants collapsed at a certain level. The socio-cultur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moral structure, especially, was not attractive any more.

[收稿日期] 2014-08-02; [修回日期] 2015-07-06

[作者简介] 黎相宜(1985-), 女,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华侨华人研究以及侨乡研究。

* 本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华人跨国流动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 14AZD06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项目“归难侨群体的多向分层融入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 GD13YHQ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周敏教授对文章提出的修改意见以及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陈杰参与了部分田野调查。文责自负。

Wenchang immigrants tried to establish an alternative relationship in social exchange based on mutual benefits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morality. However, because of conflicts o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overstretch of the administrative interference, immigrants were not able to build up a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based on mutual benefits, Wenchang immigrants failed to establish a transnational model that is driven by profit. This led to the decline of Wenchang immigrants in their hometown, which further decreased their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model effect of Wenchang immigrants. The era of sending money back to home countries in light of patriotism and philanthropy is giving away to the era that is driven by investment in global capitalism.

一、问题缘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回乡投资、捐赠,积极参与侨乡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事务,这些移民跨国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侨乡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在许多学者关注华人移民的各种跨国实践对于侨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务所带来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来自传统侨乡(广东的潮汕、梅州及海南的东部地区)的移民无论是在捐赠、投资还是其他跨国实践上都大量减少,伴随而来的是他们与家乡原有的社会联系呈现弱化趋势。^[1] 这些研究指出,侨乡模式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产生,侨乡作为一种特殊的村落共同体以及华侨的优越感与特殊意义都在衰退。^[2]

侨乡衰落的现象早已为一些学者所关注,但是以往的研究多以经验描述为主,并没有对导致这种现象形成的社会机制进行详细探讨。即使有进一步的解释,也多以华侨华人“落地生根”、新生代华人对于家乡认同淡化作为原因。^[3] 这些因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侨乡的衰落,但这些宏观背景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社会机制影响到中观的侨乡以及微观的移民个体的行动,以往研究并未有很好地进行解释。实际上,侨乡模式的衰退与移民跨国实践的减少跟各种因素的社会联结及其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华南地区的一个衰退型侨乡——海南文昌为例,讨论导致移民跨国实践减少以及衰退型侨乡形成的影响机制。笔者于2010—2013年间进行了多次的田野调查,具体的资料搜集方式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法等方法。^①

文昌位于海南省的东北部,全市总人口59万人(2012年),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约120多万人(2014年)^[4],主要分布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从移居地的社会结构来说,20世纪中叶以前的早期文昌移民,可以分成商绅与劳工两大阶层。东南亚华商的经营范围不仅局限在本地区,还有一些扩展到国际金融业、银行业、运输业和进出口贸易等跨国经济活动,甚至有些华商还会参与移居地主流社会的政治活动。^[5] 尽管文昌移民尤其是华商在移居地是少数族裔群体,但大多不属于社会底层,而是扮演介于殖民者与多数土著之间的“少数中间人”(middleman minority)的角色,经常陷入激烈的族群冲突当中。比如,祖籍文昌的马来亚华人林熙鸿就是一个典型的华商。林氏以建筑业起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受英国铁道大臣赐权,由其掌管新马所有火车站的旅店和酒吧。林氏在海南大量招收员工,导致文昌人大批涌到马来亚谋生。林氏的特权在马来西亚独立后因被主流族群质疑而遭废除。^[6] 二战后,东南亚等新兴的独立民族国家大多采取了较为激烈的同化政策,使大部分文昌移

① 基于研究伦理,本文对所有人名、学校名、企业名及部分地名(县以下)均做了匿名化处理。

民或主动或被迫地完成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融入过程，被侨乡人称之为“归番”^①。从祖籍地的情境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文昌侨乡的一部分人依靠原有的“移民链”优势衔接起一度中断了的迁移渠道而移居海外。但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逆转，导致东南亚的移民接收国失去一定吸引力，传统的“移民链”弱化。而同时，出国留学、涉外婚姻、技术、投资等新兴的国际迁移方式没有在文昌兴起。2003年的海南侨情调查表明，在1978—2003年的25年时间内，从海南省出国的新移民数为1.8万余人，平均每年为750人左右，^[7]仅相当于江门开平一个镇的移民数量。2003年以后，新移民的数量更是大幅度减少。^[8]新移民的缺乏以及老移民的同化，对海外移民与家乡的各种社会联结以及移民的跨国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分析框架：道义与交换

移民跨国实践的形式极其多样，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其中，移民的捐赠与投资活动是体现侨乡特殊意义的重要指标。^②这两种主要的跨国实践基于华人移民与家乡不同性质的跨国关系。有学者指出跨国关系是由原生性给予（primordial givens）与交换要素（exchange elements）所组成的。^[9]其中，这两种关系对应的分别是以传统道义为基础的社会文化馈赠和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盈利型跨国实践。

有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道义”因素在移民跨国实践中的重要作用。^[10]柯群英借用斯科特的“道义经济”^[11]框架来解释新加坡华人移民的跨国实践及其对于家乡的道义责任和义务。^[12]郑一省也指出，侨乡往往利用道义来重新强调海外乡亲的爱乡之情，从而获取海外华侨华人对家乡的资助。社会文化馈赠的非盈利与福利性质以及个体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经济、时间成本），不仅凸显出移民的无私与慷慨，而且还无形地塑造海外移民“爱国华侨”的“光辉形象”。^[13]而这种基于传统道义发展起来的移民与家乡的关系，更多地促进了移民的无偿性跨国实践。

基于交换关系的盈利型跨国实践（比如投资），主要是遵循社会学家布劳所说的社会交换的目的。道义固然也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但这里所说的交换更多是带有一对一的市场化的交易性质，也即当别人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这与道义体系所遵循的逻辑不大相同。社会交换往往是以互惠为基础的。齐美尔就曾提出一种互惠的交换模式，后来被布劳发展成“互惠规范”的概念。布劳认为，如果社会行动中的各个主体都遵守互惠规范，愿意为自己的所得提供回报，那么社会交换就开始了。^[14]张继焦曾经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海外华侨华人在家乡的“寻根经济”。^[15]这种交换动机在移民投资家乡的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事投资的移民主要是为了盈利，而家乡则希望从中获得发展。他们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更多是基于互惠交换基础上的。

基于此，侨乡之所以能够有其特殊的示范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乡亲源源不断的跨国实践，而跨国实践的基础又源于移民与家乡所存在的传统道义抑或是交换互惠关系。一旦这两种跨国关系减弱或断裂，移民的跨国实践就不可避免地会衰落。下面笔者以海南文昌侨乡为例，探讨传统道义以及交换关系的变化如何深刻影响其移民跨国实践的变化以及侨乡的变迁。

三、传统道义与社会文化馈赠

与许多传统侨乡相似的是，社会文化馈赠一直是文昌海外移民最传统也是最主要的跨国实践

① 由于受到汉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在文昌侨乡的语境中，“番”代表移居地，“归番”意指移民融入并同化于移居地主流社会。

② 侨汇是移民跨国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侨乡特殊意义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侨汇的接收对象主要是侨眷及其家庭，本文则旨在从捐赠和投资角度探讨移民对于家乡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影响。

模式之一。这些移民大多来自传统乡村，作为“新乡绅”的他们往往要为家乡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资源以及福利，^[16]而作为侨乡则要为那些积极承担责任与义务的移民提供“社会地位补偿”^[17]的承诺，由此形成了“馈赠—补偿”的道义传统。^[18]然而，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华侨华人在移居地的融入以及侨乡经济的发展，这种基于传统道义的无偿性馈赠出现了下降趋势。下面笔者以纪忠小学为个案进行说明。

（一）“救校”：道义传统的勉力延续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昌的侨务政策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出现转变。中央的特殊政策让边缘的海南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久又决定海南建省办特区。尽管文昌移民与家乡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于历史变迁已经变得很脆弱，而且这些文昌移民大多经历了在移居地的同化过程，但由于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显著，此时的文昌移民回乡后仍具有较大的经济优势。他们可以沿着原有的“馈赠—补偿”的路径依赖，通过社会捐赠将自己“南洋客”的身份地位在侨乡的熟人社会中表现出来，以实现跨国的阶层向上流动。

文昌南村纪忠小学的复办，就依赖于这种“馈赠—补偿”的传统道义关系。20世纪80年代，南村以旅泰为生的移民在改革开放后纷纷回来探亲。当时侨眷吴昆官等人提议，要在原有的纪忠小学校址上重建教学楼，并分别在1980与1984年前往泰国筹集纪忠小学款项。在各方积极协商下，1992年，纪忠小学正式复办。现在的纪忠小学校内还留有当时捐资建校时的芳名榜。10年后，南村新出生人口由于国家计划生育及大量人口外出打工而逐年下降，乡村社区内适龄儿童数量大幅减少。2004年，纪忠小学只剩下100多名学生，由于师资缺乏、教学质量下降，当时文昌教育局计划保留同一行政村的另一所小学作为完全小学，而纪忠小学则缩编为只有低年级（一至四年级）的初级小学。

在这种情形下，曾在建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泰国侨领吴时农得知情况后，提出要建立校董会，以确保华侨捐的钱真正用于学校建设而不是落入私人口袋。吴时农还利用自己在侨乡地方社会的声望，写信给海南省教育厅陈述救校之意：

……我们是漂洋过海浪迹天涯的一群，籍籍文昌南山大队纪忠小学校的校友。今能签得自己的名字，写一张普通的中文信，念懂中文报纸，皆得纪忠小学校之赐予。虽寄居泰国数十年，但对故乡的一草一木，样样感到可爱，永志在脑海中。反之，更随日月而俱增。据闻市教育当局曾言，纪忠小学五、六年级班次，每班缺额二三人，有意将五、六年级二班取消（即裁减）仅留初级部，同人闻之不胜惊骇……倘把高小部取消，莘莘学子须往镇中心小学就读，程途虽无关山万里，但身为家长者势必陪送迎归，非但浪费时间，况且农村经济收入有限，增加经济负担势在必行（例如车资）。依众人之管见，无论从任何角度观之，有损无益，故此，希望有关当局维持固有班级，不但可慰先贤在天之灵，也解除旅居异邦之群虑，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19]

吴时农在信中以“村内子弟读书无法就近”的道义理由反对学校撤并。而事实上，南村的学龄儿童大多随父母迁往镇区，实际在纪忠小学就读的人数较少，而来就读的大多是远在隔壁镇斗罗农场的学龄儿童。所以吴提供的理由并不充足，反对撤校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学校是海外移民辛苦捐资的成果，是他们对于家乡道义责任的物质化体现。对于吴时农等人来说，保护学校也是维持自己在南村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2002年，在吴时农等人的倡议下，家乡的吴庆瑞、吴昆官等众乡贤在南村建立了校董会。2004年4月，为避免撤并的命运，纪忠小学校董会写了一封募捐信给海外乡亲。信中首先重新发掘了长期存在于移民与家乡之间的道义关系，阐述了纪忠小学一直是依靠侨资而得以发展的历史，接着希望海外乡亲能够延续道义传统，从资金上支持纪忠小学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撤并：

……改革开放后，入学人数激增，为了满足子弟读书之要求，以南村为首的旅泰华侨偕同邻村吴氏华侨慷慨捐助几十万人民币，在本镇范围内首先兴建两层教学大楼及套间式教师宿舍，学校范围之大，教学大楼之美观……有谁能料到这么一间堂堂完全小学，有改办“初级小学”之说。其原因是学生人数少，教学质量有所下降，乡人闻悉震惊不已，急电告知在泰侨胞，共商变应对策……敬爱的先生（女士）阁下：当诸位接到此信函时会有何感慨？家乡旅泰侨胞皆是从纪忠学校摇篮奔向社会谋生立业的，当他们得悉纪忠学校要改办，心急如焚，从慨而慷：行动一献策一投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挽救纪忠学校。诸位旅泰侨胞之行、之言岂不使我们为他们而讴歌？他们是人们的先驱榜样。榜样之力量是无穷的。旅泰侨胞之精神定会产生效应，从国外至国内，从上而下会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办好纪忠学校。众志成城，聚沙成塔。人心所向之事竟成。诸位，行动起来吧！为家乡教育事业添一砖一瓦吧！纪忠学校将成为本镇东南方教育基地一颗明珠指日可待。伴同先生（女士）之宏业必定鹏程万里，前景灿烂！

经纪忠学校校董会研究决定，为表彰热忱赞助建设纪忠学校各界人士，我会特订如下表彰条例：凡赞助者金额不论多少，概在学校、镇墟张榜公布，并志其金额，几次表彰。凡赞助人民币伍佰元以上者概在学校纪念堂大理石上镌刻其芳名，并志其金额，藉表永远纪念。凡赞助教学设备者，概在器物上用金水书，写其芳名藉表纪念……^[20]

与此同时，以吴时农、吴庆祚、吴庆玠为首的泰国侨领向泰国各地的华侨发动捐款，此次共筹募到 20 多万元人民币。特别是吴时农发挥了其卓越的号召与组织能力，利用移民希望获得声誉补偿的心态发动其捐款：

吴时农很会发动当地华侨。他说，你们捐钱，就能把你或你父亲的相片永远留在纪忠小学，让小学的师生永远都看着，留个纪念。你说他多会发动人啊。他说每个人都有个牌子。^[21]

除了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外，吸引生源最重要的方法是提高师资水平，为此，许多海外乡亲出资聘请一些有教学经验的退休教师。此后，学校的教学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学生人数也逐渐提升，经过几年努力，学校不仅暂时逃过了撤并的命运，而且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名校：2007 年有 6 个学生考上文昌中学（省重点中学）、7 个学生考上文昌侨中（市重点中学）。

吴时农等人的“救校”行动，主要是不希望自己捐资的学校被撤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乡村普遍出现的“文字上移”^[22]的大趋势，为逐渐“空心化”的乡村留住了宝贵的公共教育资源。随着学生人数的回升以及师资的增加，住宿的要求随之增多。2007 年，纪忠小学给泰国的乡亲写了一封筹款信，希望能够筹款修建教师宿舍的洗澡间。没过多久，吴时农寄了 8000 元给学校。下面是学校 2007 年底写给吴时农的感谢信，对于他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

前闻悉您老人家身体不够舒服，料必近况好转吧！对此，我们全体老师甚为念挂，我们祝福您健康、长寿、幸福！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您老人家呕心沥血，关心、支持。对于纪忠学校的变化、发展、壮大，您老人家立了首功……纪忠离不开您们，您们是学校办学的强有力的后盾和支柱，您们是大功臣！刚刚建设好校园虹灯，为了改善老师的居住条件，您老人家又寄回八千元人民币，在教师宿舍增建沐浴间，教师洗刷极其方便。大家都极高兴，感激老人家对我们的关照和支持。让我们真诚地道声：谢谢！您的心、您的情、您的恩、您的德我们永远不忘，也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大家表示：决不辜负您老人家及在泰父老、大小的热心和期望，把学校办好给予报

答……^[23]

写这封信时，吴时农身体已大不如前，学校还在信中特意询问了吴的病情。遗憾的是，这封信寄出去4个多月后，吴时农在泰国去世。当时，家乡的吴昆官等人还赴泰国举行吴的追悼会，南村也与泰国同时举行了追悼会，纪念这位回报乡梓的老华侨。笔者去调查时，许多侨乡人讲起吴时农的去世仍深表感伤。由于具有号召力与凝聚力的领导人物的缺失，南村纪忠小学一下子失去了有力的支撑。

（二）“撤并”：道义传统的难以维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居住在泰国、从事旅店生意的南村移民的资产经出现了大幅度的缩水，很多华裔企业就此一蹶不振。同时，侨乡本地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移民在这种背景下，连原来所剩不多的相对经济优势也消失殆尽。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国家的侨务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96年国务院出台政策，规定华侨华人在为公益事业进行捐赠之后要缴纳关税，并在捐建工程项目后缴纳各种规划建设等费用。尽管这是全国统一的政策，但对于海南移民的跨国实践尤其是非盈利的社会文化馈赠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据有关资料统计，1994年国家实行优惠政策期间，当年海南省接受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捐款捐物总价值超过5000万元，但在停止执行优惠政策之后的2003年，捐款捐物总价值仅为1527万元。^[24]文昌所接受到的侨捐锐减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一政策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上述严峻形势下，纪忠小学还是在以吴时农等人的鼎力支持下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但2008年吴时农去世，加上与家乡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一代华侨逐渐上了年纪、不再掌握经济权，南村海外乡亲与纪忠小学所延续的道义关系受到了剧烈冲击而趋于弱化。纪忠小学也不可避免地像其他乡村小学一样面临着发展的困境。

由于吴时农在世时成立的校董会基金还有余留资金，因此当时纪忠小学依靠这批存款得以继续聘请优良师资，维持学校的日常运作。但从那时开始，学校校董会基金只有支出没有新的捐款。2010年笔者对当时的代任校长林志廷进行访谈，林校长说“华侨现在捐资也不多了。自从八公（指吴时农）过世后，资金就不是很多了。陈宇环（原校长）也有去见华侨，希望能够筹款，但效果也不佳。”^[25]

2011年，校董会基金由于“只进不出”，终于渐渐耗竭。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纪忠小学没有再收到校董会基金的捐款。由于没有额外的资金聘请优良师资，在短短两年内，纪忠小学的学生人数大量减少。2013年春节笔者前往南村进行补充调查时得知，当时纪忠小学虽然还没被撤并，但全校学生人数仅有40多人，创历史新低。不仅原来就读的附近生源减少，就连南村的学生也大多到镇中心小学就读。^[26]

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我国乡村人口大量外出，加上政府希望集中资源办学等因素的影响，几乎所有基层乡镇中小学都面临着撤并，其他侨乡也面临着与文昌同样的问题：曾经捐资的学校被撤并引起很多海外华侨华人的不满。但由于移民与家乡所形成的社会联结的差异，侨乡与海外移民对于这种乡村公共教育资源的“上移”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比如在开平，尽管撤并之风也盛行，但侨乡地方政府及社会鼓励将侨资转移到被并入的学校或是其他的公共事业中去，而移民也十分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样既能够延续基于“馈赠—补偿”的传统道义关系，也有利于移民实现社会地位补偿，“挽回”由于学校被撤并而失去的“面子”。而在文昌，由于原本存在于移民与家乡之间的传统道义关系已经十分脆弱，导致移民给予的社会文化馈赠逐年减少，海外移民与地方政府形成抗衡的社会力量趋弱，很多侨捐小学及中学难以逃脱被撤并的命运。

四、交换互惠与盈利型跨国实践

张继焦曾指出海外华侨华人与家乡所潜藏的一种社会交换关系。^[27]但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建立

通常依赖于家乡的区位、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与行政干预等社会经济因素。随着与家乡基于道义的社会关系的没落,不少文昌移民回乡,试图与当地重新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道义的、互惠互利的社会交换关系,发展出一种既可赚钱又可普惠地方的盈利型跨国实践模式。

新加坡移民韩广回乡办的“华侨农庄”就是将盈利与公益的思路结合起来的一种跨国实践。韩广是较早回来参与家乡建设的移民之一。从1983年开始,他频繁地回到家乡参与社会经济事务:1988年韩广在文昌投资100万元建海华酒店,1995年又投资200多万元建机器厂。1996年他还在文昌的清澜港投资90多万元新建港口仓库一幢,后来港口被中央批准为一级开放港。除了投资之外,韩广还积极将资金投入到家里的公益事业中:1996年为家乡建造一条新公路,建成后又花费大量资金进行维护保养至今。同年,他捐资了11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然而遗憾的是学校经营6年后被关闭了。

在韩广众多的捐资、投资项目中,最耗费他精力与财力的是耗资1600多万元兴建的华侨农庄。华侨农庄占地两百亩,有19座别墅,大部分租赁给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笔者第一次见韩广就是在华侨农庄。他一见面就向笔者介绍自己对于家乡的贡献。随着谈话的深入,他很快谈到了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他想将投入大量资金的华侨农庄发展成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并且想在华侨农庄附近征一块地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由于华侨农庄的所有房子都是没有产权的,他向市政府提出盘下这块地来发展,但国土局那边迟迟不给征地指标。说到此时,韩广略显激动:

只有办加工业才能够发家致富,能够让村民进厂做工人,可以把剩余农产品加工,可以出口到新加坡去。因为新加坡地贵、人工成本高,如果运到新加坡是很受欢迎的。我不是来赚钱的,我是想着来发展我们农村的。但现在政府就是不给我征地的指标,我都和这附近的村庄说好了,村民代表都盖了手印,市政府也批了文件,但是国土局就是不给我指标。说起这个我就很气。从去年一直拖到今年,我每次去政府,都说现在没有指标,再等等。我去多了人家也烦了,干脆就说“我开会啦,我忙啦。”让我去到那里从早等到晚上,都没有回答。^[28]

尽管韩广在表述中反复强调自己的经济行为具有公益与福利性质“不是来赚钱的,我是想着来发展我们农村的”,但依然无法掩藏他的“求利”动机,他之所以来文昌投资,完全是“因为新加坡的地贵、人工成本高”。韩广原本想利用家乡廉价土地从中获利,而政府迟迟不给征地指标,严重影响了他的经济利益。紧接着,韩广就抱怨现在的地方政府“忘恩负义”,忘记了华侨曾经对家乡的贡献,而抬高了侨资进驻的标准:

现在领导就会去巴结那些大老板,他们就想留指标给那些大项目、大投资者,完全不理睬我们这些小项目的。现在政府就是表面讲得好听,但是根本就不重视你华侨,都是名义上的重视……现在的很多政府官员就觉得华侨没有钱了,没有用了。^[29]

为了这个征地指标,韩广这几年都奔波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相互推诿责任或搪塞其他理由,受到冷遇的韩广很不是滋味“我觉得我就像一条狗啊,天天跑到政府去。”^[30]由于韩广迟迟无法拿到征地指标,华侨农庄还不具备产权。韩广既无法将华侨农庄里的别墅卖出去(目前只是租赁),也无法在周边发展农业及加工业。投入过多的韩广陷入被动局面,撤资又不甘心。华侨农庄就好像“烂尾楼”一样被搁置在乡镇上。笔者也曾就此事询问过相关政府部门,但给予的答复大多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这个不归我们部门管的”。后来笔者从一名熟悉的侨务干部处得知,每年国土局的征地指标有限,想给一些更有利润的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数是内地的企业。^[31]

由此可见，侨乡与移民的关系还受到政府行政体制与侨乡本地经济因素的影响。有许多像韩光一样的文昌移民由于不熟悉家乡的相关政策以及制度，再加上家乡的一些相关制度并不完善，往往在投资上碰到不少困难。有不少移民向笔者表示，在文昌能够赚到钱的是少数。由于受到祖籍国与移居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祖籍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等多层结构因素的影响，文昌移民希望建立互利关系的愿望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这使得文昌移民与家乡普遍难以形成良性的社会交换关系，进一步导致盈利型跨国实践模式在文昌移民中并不普遍。

五、结语

本文以华南地区的一个衰退型侨乡——海南文昌侨乡为例，探讨了基于传统道义与交换互惠两种跨国关系的移民跨国实践的变化以及给侨乡带来的影响。

研究发现，文昌的海外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经济与声誉地位同时上升的过程，再加上受到多层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纯粹社会声誉与身份归属方面的补偿不再对其构成吸引力，加上新移民的减少以及侨乡经济的发展，使得文昌移民与家乡一直持续的传统道义关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毁，在道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无偿性社会文化馈赠在急剧下降。此外，尽管海外移民在侨乡的跨国实践带有回馈家乡的道义性质，但这种馈赠并非完全不需要回报的。按照潜在的侨乡社会规范，受惠者通常表达感激之情，并为这些海外乡亲提供声誉资源的补偿。因此，当家乡缺乏相应的非物质回报时，社会文化馈赠也随之受到影响。

随着与家乡基于道义的社会地位补偿关系的没落，不少文昌移民依然试图与家乡重新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道义的、互惠互利的社会交换关系，发展出一种既可赚钱又可普惠地方的跨国实践模式。但由于海外移民与当地政府的土地纠纷、行政干预等问题，使得盈利性跨国实践也没有大规模兴起。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导致文昌移民在祖籍地的跨国实践逐渐衰落，也使得侨乡特殊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效应逐渐式微。

然而，必须进行重点说明的是，上面讨论的仅是文昌移民群体在其祖籍地的跨国实践，这种跨国实践虽然在整体趋势上呈现衰落迹象，但是却不排除两种情况：其一，在文昌的个别区域，跨国实践比如传统的社会文化馈赠以及盈利性的投资仍然在持续；其二，文昌移民作为东南亚华人移民的组成部分，他们中有不少人的跨国实践放在了非祖籍地。他们在家乡^①之外的跨国实践未必呈现衰落的趋势。

实际上，有研究表明，东南亚华人的跨国实践模式往往超越侨乡，而且以投资性跨国实践为主。^[32]他们会根据区位、投资政策、劳动力价格等多种经济因素，选择到拥有良好投资环境的非祖籍地进行经济盈利活动。王赓武就曾指出，按期捐献大笔款项、资助故乡家族的陈嘉庚模式在东南亚并未流传下来，华人本着爱国和慈善精神汇款回中国的时代，已经转变为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着重投资的时代。^[33]

[注释]

[1] 程希 《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世界民族》2006年第5期；黄晓坚 《广东澄海侨情变化与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黄静 《潮汕与中国传统侨乡：一个关于移民经验的类型学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 陈杰、黎相宜 《海南冠南侨乡公共文化空间的变迁——兼论侨乡范式的式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0期。

① 这里笔者将家乡的概念限定在县及县以下。就文昌移民来说，他们在文昌及其下辖的村镇的跨国实践视为在家乡范围内，但他们在文昌以外（比如在海口）的跨国实践则视为在家乡以外的跨国实践。

- [3] 黄晓坚 《广东澄海侨情变化与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周聿峨、曾品元 《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程希 《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世界民族》2006年第5期；黄静 《潮汕与中国传统侨乡：一个关于移民经验的类型学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4] 文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 《2013年文昌年鉴》，南方出版社，2014年。
- [5] [32] 周敏、刘宏 《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 [6] 冯子平 《海南侨乡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第165~166页。
- [7] 张朔人、于苏光 《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
- [8] 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内部数据。
- [9] Ruben Gowricharn, "Moral capital in Surinamese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04, Vol. 27, No. 4, pp. 607-621.
- [10] 陈杰、黎相宜 《道义传统、社会地位补偿与文化馈赠——以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移民的跨国实践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Jørgen Carling, "The Human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ism: Asymmetries of Solidarity and Frustration", Presented at SSRC Workshop Migration & Development, New York, November 17-19, 2005；柯群英 《人类学与散居人口研究：侨乡研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Khun Eng Kuah,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Aldershot: Ashgate, 2000, pp. 134, 136.
- [11] 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译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0、52、170页。
- [12] 柯群英 《人类学与散居人口研究：侨乡研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Khun Eng Kuah,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pp. 134, 136.
- [13] 郑一省 《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的民俗活动》，《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6期。
- [14] 彼德·布劳著，孙非、张黎勤译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6页。
- [15] [27] 张继焦 《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27~228页。
- [16] 陈春声 《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的转型——论清末潮州社会向“侨乡”的转变》，徐杰舜、许宪隆主编：《人类学与乡土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2005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 [17] 黎相宜、陈杰 《社会地位补偿与海外移民捐赠——广东五邑侨乡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黎相宜、周敏 《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 [18] 陈杰、黎相宜 《道义传统、社会地位补偿与文化馈赠——以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移民的跨国实践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
- [19] “2006年5月吴时农写给海南教育厅的信”，2010年2月25日村民吴昆官提供。
- [20] “2004年4月20日筹款募捐信”，2010年2月笔者在文昌南村吴昆官处所收集到的文字材料。
- [21] 2010年2月25日笔者在文昌南村对侨眷吴昆官的访谈。
- [22] 熊春文 《“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 [23] “2007年12月10日给八公的感谢信”，2010年2月笔者在文昌南村吴昆官处所收集到的文字材料。
- [24] 鞠海龙 《海南侨务工作概论》，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 [25] 2010年2月26日笔者在文昌对纪忠小学代理校长林志廷的访谈。
- [26] 2013年2月14日笔者在文昌南村对侨眷吴昆官的访谈。
- [28] [29] 2011年4月14日笔者在文昌华侨农庄对新加坡华人韩广的访谈。
- [30] [31] 2011年5月13日笔者在文昌对侨务干部黄先生的访谈。
- [33] 王赓武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林孝胜编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等联合出版，1995年，第19、31~32页。

[责任编辑：乔印伟]